

◎ 楚文化研究会 编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六集

湖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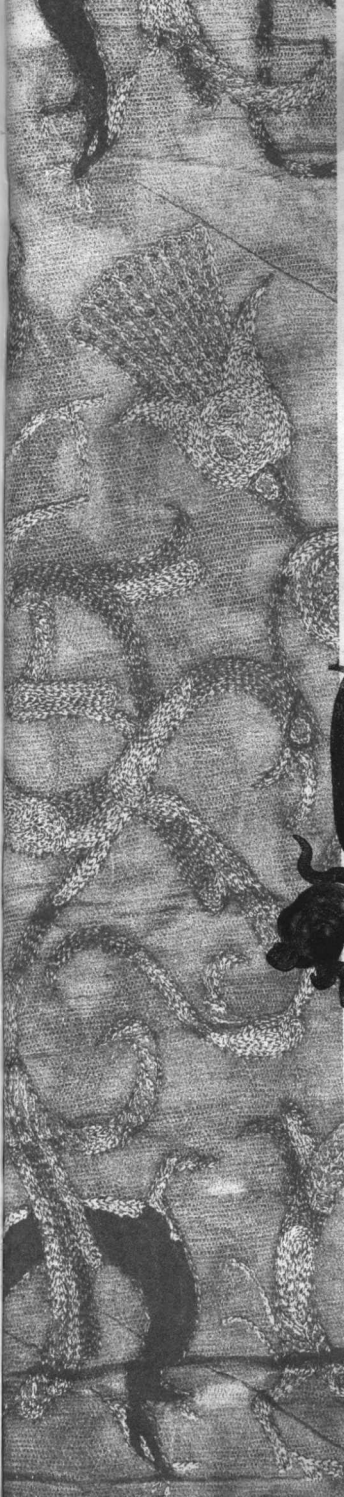


◎ 楚文化研究会 / 编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六集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 6 辑/楚文化研究会编.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ISBN 7-5351-4186-2

I. 楚… II. 楚… III. 楚文化-研究-文集
IV. K871.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I21677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 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430223·武汉市江夏庙山开发区汤逊湖工业园)

开 本:850mm×1168mm 1/32 22 印张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508 千字 印数:1-2 500

ISBN 7-5351-4186-2/K·116

定价:4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 巴文化、楚文化与巴楚文化 张 硕(1)
- 论楚国对中国古代矿冶技术创新期的贡献 卢本珊(12)
- 试析浙川和尚岭出土的一件嵌红铜画像铜壶 李 琴(28)
- 楚及相关墓葬出土竹简制作工艺的综合考察 后德俊(38)
- 枣阳毛狗洞 H1 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蔡路武(45)
- 释信阳楚简中的“碇石之碇” 黄凤春(54)
- 先秦敷陈之礼兼及楚简名物 张吟午(64)
- 夔文化的考古学证据 孟华平(71)
- 先秦礼车制度初探 笪浩波(81)
- 宋玉《小招》需要校改的文字 李啸霏(104)
- 楚系墓葬出土漆豆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聂 菲(108)
- 论湖南战国墓出土的巴蜀文物和巴人墓 高至喜(121)
- 楚都钜阳城试探 汪景辉(135)
- 三峡地区春秋战国冶铁业考古发现与研究
..... 杨 华 陈文武(142)
- “辟邪”考略 翟玉莘(153)
- 从南漳宜城出土的几批蔡器谈春秋楚郢都地望 ... 徐少华(157)
- 西汉玉器的楚文化因素 方 林(168)
- 楚简车名汇释 萧圣中(175)
- 西周楚国落后说相关史料辨证 罗运环(185)
- 楚、秦两国射技以及弓矢的比较 耿华玲(191)
- 楚国行书制度管窥 [日]广濑薰雄(202)
- 凤形嘴、高泉山出土青铜器的年代与族属 郭胜斌(212)
- 秦、楚两国庶民阶层比较初探 王 准(222)

- 楚遣策制度述略 刘国胜(229)
- 钟祥黄土坡五座铜礼器墓分期研究 郑忠华 许道胜(241)
- 河南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曹桂岑 曹青(251)
- 楚系金文研究的新进展及相关问题 刘彬徽(262)
- 赤壁土城浅析 杜峰(269)
- 铜绿山古铜矿与楚国的强盛 龚长根 陈军(282)
- 浅析湘中地区越楚文化在春秋晚期消长变化的一个特点
..... 熊建华(292)
- 寿县李三古堆大墓墓主考辨 胡欣民(299)
- 湖北襄樊真武山遗址西周时期遗存族属试探 黄尚明(309)
- 历史不是橡皮泥
——对“佛像入楚”再质疑 邵学海(314)
- 楚墓出土工具考察 傅聚良(328)
- 古蜀天门观念与蜀楚关系探讨 黄剑华(343)
- 楚国漆耳杯在丧礼中的作用与古代墓葬牛肉祭祀品的关系
..... [美]柯鹤立(354)
- 1952—1980年间的楚简研究 陈伟(373)
- 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的“禹政” 晏昌贵(384)
- “卜筮祭祷简”所见战国楚的王权与世族、封君
..... [日]工藤元男(393)
- 望山楚简研究述评 许道胜(406)
- 郢于略论 万全文(426)
- 九连墩1、2号楚墓的年代与墓主身份 王红星(430)
- 楚人时日禁忌初探 胡雅丽(439)
- 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考古学观察 张昌平(450)
- 试析《左传》中的楚《柁机》资料 [美]蒲百瑞(455)
- 再论楚郢都的地望问题
——纪南城是否春秋时期的郢都? [日]谷口满(463)

九连墩 1 号楚墓人甲的复原与初步认识	王先福(476)
楚文化渊源新思考	高崇文(488)
“寿春”铅钣冥币辨伪	刘和惠(495)
楚礼庙制研究	
——兼论楚地的“淫祀”	杨 华(500)
楚与两广之越关系初探	祝诣博(512)
睡虎地《日书》“除”篇、“官”篇月星关系考	王胜利(519)
“缙衣”小考	陈松长(533)
读《尊德义》札记(增订篇)	[美]顾史考(538)
说山字纹铜镜	贺 刚(552)
试论楚国车马阵容	黄文新(575)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补释	陈秉新(585)
楚国青铜剑浅谈	杨立新(593)
东周漆器兽面纹的类型与特征	院文清(605)
汉王朝的成立与秦楚社会	
——关于《奏谏书》高祖六年案件	[日]藤田胜久(621)
楚秦审判制度比较概观	刘玉堂 贾济东(635)
“德之行”与“行”的哲学意义	郭梨华(644)
说上博楚简《缙衣》篇中的“悒”	曹锦炎(657)
战国文字中的“穴”	贾连敏(662)
近年来郑韩故城重要考古发现	马俊才(669)
盩公买簠及相关问题	吴晓松(675)
河南潢川出土蔡公子簠考证	郝本性(680)
岭南地区汉墓出土簠形盒渊源试探	
——从簠形盒看楚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	高成林(683)
后记	(698)

巴文化、楚文化与巴楚文化

张 硕

楚文化和巴文化是我国古代各自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其面目已基本廓清。而号称“似巴似楚,亦巴亦楚”的混融性地域文化——巴楚文化目前尚在被发现、梳理和总结之中。要准确把握巴楚文化的内涵,首先涉及到的便是巴文化和楚文化的源头问题。

一、巴人早期的历史文化

大凡中国远古时代的部落名、族名、邦名乃至国名均与其发源地、居住地地名及发源地、居住地的地理、人文环境等要素有关联。巴也未能例外!

但有关“巴”名称的由来,众说歧出,各执一词。有人认为因为巴人所居近水,水流蜿蜒呈“巴”形而得名。《华阳国志》卷34《渝州》条下云:

《禹贡》梁州之域,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

还有一种比较离奇的说法是以虫、蛇之属来解释。东汉许慎所著《说文》中述及“巴”字时说:“巴,虫也。或曰食象蛇。”而《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说:“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这种看似不经的说法也有一定的流布,后来还据此衍生出“巴蛇吞象”的成语来。

《史记·张仪列传》中有“苴、蜀相攻击”的记载,唐代司马贞

作《史记》的《索隐》时解释道：“直言巴。……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为巴。”而苴就是四川、湖北等地皆有生长的芦苇，而且两地都有将它俗称芭茅的习惯。也就是说，因该地的常见之物有苴(巴)，导致了巴名称的由来。

徐中舒先生别创新见，他认为：巴之本义为坝，按之古音韵，巴、坝同音，而在《广韵》坝下也说：“蜀人谓平川为坝”。因此他主张巴族是古代居住在平坝地区的一个民族，巴亦由此得名^①。

童恩正先生的思路与徐中舒先生很接近，他也是以巴人的居住地作为思考出发点，只不过他联系到巴族的祖先廩君有生于石穴的传说，而在川东地区的方言中又长期地呼石为巴，那么巴最原始的含义，可能就是“石”或者“石穴”，巴氏族可能即因其居住环境多巨石而得名^②。

以上几种说法阐明的是一个共同特征，即巴人的居住环境。因此，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在古代，有那么一支民族，曾经长期生活在鄂西川东的平坝地区，四周多山，山上多巨石，石间生长大片芭茅，芭茅林下虫、蛇出没游弋……这个民族的先民因其居住环境、山水物产，依其语言习惯，自称为“巴”，此即巴名称的由来。只是以后随着巴族历史、文明的进步，才逐步发展成为部落、民族、国家和地区的专名了。

同“巴”名称由来这个问题一样，巴人的起源也一直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难题。

《山海经·海内经》认为巴人的祖先是“太昊氏”(即伏羲)，其中云：“西南有巴国。太昊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山海经》是反映古代南方文化的作品，其中记载了很多南方民族，尤其是西南民族的神话，从这一点上看，其记载可供参考。然而，太昊氏可能是某一民族的神话人物，而后渐渐流传成了共同的神话人物。因此，以太昊氏为巴人始祖是不足以服人的。

在更晚出的《华阳国志》中,认为巴人是黄帝的后代。《华阳国志·巴志》云:

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圉。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圉。圉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

《华阳国志》成书于晋代,其作者欲将巴民族归于“三皇五帝”谱系之中,将各少数民族文化归于中原华夏文化体系之中的意图十分明显。因此,这种说法也是不足为凭的。

而被相当一部分论者引述的有关“廩君种”的传说,被认为是巴人对自身历史的追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辑录。这段文字记载内容包括了巴人最初发源的地区,巴人的风俗习惯,巴人各部落氏族间争夺部落首长职位的斗争,巴人向外迁徙的路线等等,内容丰富且成体系,因而流传最广,引用最多。但是,这段记述,由于也夹杂了些许的神话传说,尤其是没有文物考古学科实物证据强有力的支持,后世持论谨慎的学者或莫不敢信,或者仅仅是存此一说。宋代乐史撰写《太平寰宇记》,转引《世本》中的这段记载时,就发出了“廩君种不知何代”的感慨!

1955年,潘光旦先生著有《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长文,他认为“巴人的起源有远近两种传说”,太昊氏生于成纪(今甘肃天水),巴人从成纪出发,朝东南方向作扇形流徙,其中一支到武落钟离山所在的清江流域定居了下来。潘光旦先生的结论是:巴人源在西北而流在中南。这是一个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说法^③。

今天,我们重新探讨这个问题,更可以综合运用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成果,来共同攻克巴民族起源这个课题。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宝鸡市先后发掘清理了27座

西周时期的墓葬，出土 13 件剑。这些剑，剑身和茎连铸，剑身偏长，无格，作柳叶形，被称为“柳叶形剑”。

而这种扁茎无格、形如柳叶的柳叶形剑正是巴文化典型器物中的典型，故又被冠以“巴式剑”之名。

据粗略统计，截止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已发现柳叶形剑约 185 件，大半都出土在四川的成都地区一带。

成都和宝鸡两地同为重要的柳叶形剑的出土地，由是在学术界又产生了究竟谁是柳叶形剑起源地的争论，亦即谁“源”谁“流”的问题。

对于广泛见于成都等地的“巴蜀式”柳叶形剑，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西周时代宝鸡茹家庄、灵台白草坡等处出土的那种扁平无格青铜短剑直接发展而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号为“巴式剑”的柳叶形剑实际上起源于陕甘地区，而且早期形态的巴式剑多见于宝鸡地区。

与柳叶形剑同时被称为巴文化典型器物的还有：巴式矛、巴式戈、巴式钺、巴式盾等。它们的早期形态都见于陕西城固这个地方。

号为巴式青铜器的剑、戈、矛、钺等器物群的早期形态均出自黄河流域的城固、宝鸡等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物从其主，那么制造、使用这些器物的巴民族的族源当也在这个地区。这是考古学提供的一个实物证据。

在殷商甲骨卜辞中，有武丁征伐巴方一事。这说明在至少商代中期，巴人就有关了。

唐兰、顾颉刚等学者已经大致认定巴方的地望就在商王国的西边，及至汉江上游城固一带逐渐出土了大量富有地方特色的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以后，更多学者趋于认同巴方在陕南的汉江上游地区^④。

所以，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殷周

之际，巴人就已经在汉水流域的汉中盆地聚居了。实际上，汉中盆地及大巴山南北迄今仍出没大蛇，倒也符合“巴”字之由来。

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把视野稍微放大一些，那就可以看到，从渭河上游和汉江上游到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和白龙江，是戎的本土，是羌的“巢穴”，也正是巴人的摇篮。这个地方离成纪和黄河都不远，恰好与传说吻合。

周王朝建立后，将姬姓宗族封到巴族聚居地，建立起亲周的藩封之国。巴此时乃堂堂正正的姬姓之国，为诸侯之一。故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洛邑时，巴国亦在被邀请列。

巴子国的建立，在巴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到东周之时，巴国已经发展为一个地括今陕、渝、鄂等大部分地区的南方大国。

在巴国的发展过程中，巴人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具有鲜明民族、地域色彩的文化，如巴式兵器、乐器、舟船、民居、歌舞、服饰以及婚丧习俗等。

巴国是商周时期的南方大国，巴文化是商周时期令人瞩目的地域文化。

二、楚人早期的历史文化

后人考索楚之由来，首推的论据是《史记》卷四十《楚世家》。《楚世家》云：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为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

姓；六曰季连，半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向以表述严谨著称的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透露，楚人的始祖应是祝融。那么，除太史公的记载外，是否还有其他可供支持的证据呢？

身为楚人的三闾大夫屈原在《离骚》中尝自述家世，他自称“朕皇考曰伯庸”，皇考即祖考，也就是高祖。而祝融之“融”，冬部喻纽；伯庸之“庸”，东部喻纽，冬、东二部古音为旁转，因而上古之时，“融”与“庸”音同字通，包括饶宗颐、张正明等一批学者均深信屈子所言伯庸即祝融，亦即是楚之远祖^⑤。

而最新近、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当属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考古发现。1987 年，在湖北荆门包山 2 号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筒。墓主是战国中晚期之际的楚左尹邵砣，竹筒记录着墓主奉祀的祖先的名字：老僮、祝融、鬻熊。这个发现再次印证了楚人的始祖实为祝融。

所以说，祝融为楚人的始祖当系毫无疑问的。

祝融部落集团居于中原，这是诸多文献一致的说法。而祝融之后的季连部落的居留地，文献上没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以致后世众说不一，目前所见有旧许说、鄢说、从祝融而居郑说等等，但所持论据均不足以令人信服。今有学者目光独到，蹊径另辟，认为季连部落的居地似乎更应当从与“楚”有关的地名或族名中探求，因为诸多文献中，均将季连视为第一个直接与“楚”有关联的人物。

顾颉刚先生认为：丘本是土高之名……当秋水时至之时或洪水暴发之日，只要住在高丘的人就能够免于水患。与此相佐证的是，《左传》中以丘为地名者达 48 个，皆是人口聚居的邑落。所以，楚丘也应是半姓季连部落早期的集居地。

据清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考证，楚丘有二，即位于河南滑县的北楚丘和位于山东曹县的南楚丘。由此看来，或许季连部落初居于今河南滑县东的北楚丘，后迁至今山东曹县东南的南楚丘。迄今，以“𠄎”为姓者，不过数千人，其中大半又集中居住在今河南安阳以东曹马村。安阳位于滑县以北，二地相去不远。大概𠄎姓季连部落当时聚居的北楚丘也包括了今安阳一带，今𠄎姓居民即可能是季落部落的嗣息后裔。

《说文》“楚，丛木，一名荆也”。楚本是植物名，楚丘当系林木茂密的高地。季连部落居于楚丘日久，便因其居地环境特征而自名为楚，这也就是古人所谓的“以居为氏”了。及至季连部落后裔进一步南迁江汉地区，楚遂由部落名而演变成为国名了。

南下的楚人到熊绎之时，第一次被封为“子爵”，领有子男之田五十里，楚得到周王室的正式承认，楚人的部落首领于周为“侯”，于楚则为“王”了。其时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末或公元前 10 世纪初。

受封爵，领秩田，事天子，贡方物，还参加诸侯盟会，凡此种种，表明楚诸侯国的确立与巩固。熊绎的第四代孙熊渠，仗藉国力日盛，中原周王室无暇顾及之际，开始征讨蛮夷，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也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的序幕。

当时，与楚国为邻的蛮夷构成是：周围有楚蛮，西南有濮人和巴人，东南有扬越。

楚武王之世，除了三伐随国外，还开拓了“江汉之南”与分散于各地的百濮部落的大片土地，又联合巴国打败了邓国，夺取了邓国大片土地。楚还一度打败郢国与绞国，吞灭了权国、罗国与卢戎等，真正可谓是雄视汉东了。

这些祝融的后裔，继续移居鄂西北，进一步与楚蛮为伍。尽管是避难而来，他们毕竟挟有比楚蛮先进的文化因子，因此，随着版图的扩大，以政治上的统一为前提，他们领导楚国境内其他民族逐

步走向文化上的统一了，也就是楚文化的喷薄而出。

鼎盛时期楚文化的门类和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天文、历象、算数、冶金、织帛、髹漆，筑陂、筑城、筑室，道术，辞章，艺事等等。它们的成就，不仅领先于当时中原诸国，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

三、巴、楚文化的交融与巴楚文化的形成

如上所述，巴文化是商周时期发祥于汉水上游、至东周时期茁壮成长并覆盖今汉中、重庆到鄂西南巴国故地的区域文化，是巴人创造的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西南蛮夷文化。

而楚文化则是西周时发祥于今日湖北、至东周兴盛并覆盖当时南土半天下的区域文化，它是楚人汲取中原文化精华、融冶南北文化而创造出的南方华夏文化。

巴文化与楚文化，本是既不同质又不同系的两种文化。然而，它们在特定的时代和区域，由碰撞而融合了。巴、楚文化的杂糅，一直伴随着巴、楚两国交往的始终。

巴、楚之间的交往，大概自楚人先民南徙至汉水流域就开始了。

楚人先民在商代被迫从中原南徙至今豫西南、鄂西北地区，与世居南方的荆蛮杂处，此时巴正位于楚之西北，楚人与巴人为邻而居。

整个西周时期，巴、楚基本上是各自守土而居，偶有交往，相安无事。

从西周晚期开始，巴、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楚乘势而起，而巴国势力的扩张要缓慢得多，它一方面固守本土，同时更有守土防楚之志。

楚庄王时，楚、巴联兵灭庸。灭庸之役，是巴、楚关系发展到最

为亲密阶段的标志。

总的说来,巴、楚在春秋之世的大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修睦和好的,两国之间还互通婚姻,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夫人巴姬乃巴国王室之女。巴姬后来生下楚平王。

春秋末年,楚、巴交恶,巴人大举伐楚。这场战争以巴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巴人由此一蹶不振,巴人抑或在这时被迫南迁至宜都以西的清江流域一带。

战国,巴、楚冲突和战争频繁。两国交战的大势是楚胜巴败、楚进巴退。最后,巴人不得不窜入川东,沿江筑关以拒楚人。而楚人则一鼓作气,不仅吞并了巴人在鄂西南的世居之地,且将国之西境直抵今川东涪陵一线。

楚国是由东向西推进的,亦使得巴国的都城由丰都、涪陵、重庆、合川,而至阆中不断迁徙。

我们不难发现,巴、楚两国因比邻而居,版土所涉互有交错,因而交往频繁,文化的交流也随之发生。在前期,古老的巴文化对新兴的楚文化影响甚大。后期,随着楚国势力的扩张,巴的国土大部沦为楚有,巴人亦化为楚民,巴文化被动地融入楚文化的体系之中。

巴、楚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有很多文化现象是一直贯穿两个地域文化的发展过程之中,如:巴、楚语言的通用。因巴语目前知之甚少,我们以楚语为例,其中就涵容了许多巴语成分。据《左传·宣公四年》记载,楚人呼乳为“谷”,称虎为“於菟”,楚成王时的令尹子文刚刚出生就被抛弃于荒郊野外,幸被一只老虎哺乳而救活,所以又被叫作斗谷於菟。这“於菟”一词,即为巴语。子文系楚王族斗伯比与郢国公主的私生子,郢的土著也是巴人,巴人崇虎,因而有“虎乳子文”的传说。

习相近,也就是一些生活习性颇为接近,这在生产、居室、饮食等方面表现尤甚。刀耕火种是包括楚、巴在内很多南方民族的生

产方式。巴、楚本义均有草、木的含义，巴、楚国得名类同，居习也近似，早期的房屋、城池大都为草木结构，外围喜用草木扎成棘围或篱笆。

性相近，也就是说在一些信仰、崇拜方面有共同一致的对象。楚人崇巫尚鬼，以致巫觋祀神之风长盛，人神杂糅之俗不衰。巴人是否崇巫尚鬼，因史籍多有阙载而知之不多，但从后世有关巴人故地的民风民俗记载，以及迄至今日仍流存于巴人故地的巫风巫俗来看，巴人当也是信巫鬼、隆淫祀的。此外，巴族和楚族都崇拜火，是南方两大崇火民族。

巴歌楚舞，各显风姿。楚人能歌善舞，巴人且歌且舞，这从诸多文献记载、许多出土文物及今日巴、楚两地的余韵流风均可窥见一斑。“下里巴人”的故事，更是反映了巴人歌舞在楚地传播之盛、影响之广。

进入春秋以后，巴楚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两种文化因素同生共存的情况非常普遍。根据考古发现，在春秋战国时的巴楚交错地带或是巴人与楚人杂居的地方，特别是峡江地区，大量可见巴、楚文化共存杂糅的现象。如四川宣汉罗家坝、重庆涪陵小田溪、秭归柳林溪、宜昌前坪等处墓葬或遗址中鲜明地呈现出巴、楚文化糅合融通的特点。可以说，自春秋以降，南方地区的这两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个性张扬的民族区域文化开始了交流、混融，进而涵化、结晶的历史进程。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广泛交融，最终导致了“巴楚文化”的形成。

也就是说，巴楚文化是巴文化、楚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交汇融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混融性区域文化。也正是因为这种混融性，巴楚文化呈现出一种“非巴非楚、半巴半楚”的文化形态。

目前，对巴楚文化的认识还处在一个初步阶段，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巴楚文化的内涵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巴楚兵器、巴楚乐器为标志的青铜冶铸工艺；
2. 以干栏式、吊脚楼式建筑为特征的建筑艺术；
3. 以虎座飞鸟和虎座凤鸟悬鼓为标志的髹漆工艺；
4. 以屈宋辞赋为标志的巴楚文学；
5. 以“信巫鬼，重淫祀”为标志的社会风习及这种风习的重要艺术表征(如“跳丧”)。

“青黄杂糅，文章烂兮。”作为中国古代区域文化的一脉，巴楚文化崭新的文化面貌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大力发掘和认识。

注释

- ① 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 ②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 ③ 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4辑，1955年。
- ④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1939年12月北京辅仁大学作为《辅仁大学丛书》出版；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地图出版社1955年。
- ⑤ 饶宗颐：《楚帛书》，香港中华书局1985年；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